

研习心得报告

楊凡舒 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在接到研习营发到手上的厚厚几大本读本及讲座材料时，我依旧未有开始这场“闽粤·海洋”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实感。然而，南国八月烈日下的连续行走、汗流浹背于各处祠庙屋檐下的阅读和听讲，以及舟车转场之间或隐或显的山海边角，才是这次研习旅程的深刻体验。

随着研习营密集的行程设计，我们从阳江海陵岛的“南海一号”开始，从一艘南宋沉船进入此一历史时段的海上贸易状况与人群生计，研习路线一路沿海岸线行进，由粤入闽，从珠海、中山、广州、汕头、泉州、厦门，从城市到乡村等各个面向，了解自汉唐到明清、直到 20 世纪的海洋人群的聚散和生计活动。不仅体力消耗巨大，配合读本阅读及随行导师的讲座，每日的信息量和讨论也同样激荡。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不论是面对沧海桑田的古港还是尚有庙宇、社坛的村落，老师们时时提醒：放下原有的设限，多多联系，多多想象。

由于自己的学习背景，首先吸引我的反而是相对晚近的历史信息，参与反帝制革命与现代中国图景创建的一批人（孙中山、唐绍仪、苏曼殊等）本在我相对熟悉的知识体系之中，人物与人物、空间与空间的联结在“闽粤海洋”这一层面逐渐建立：活跃在近代中国的这一批闽粤人，他们的父辈可能就是买办、行商，而再上一辈或者祖辈，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海上人群”，他们以渔民、商人、海盗、山寇等等身份与海洋发生联系。从海上人群的代际关系，沿海城乡之间的关联中，我重新考量对于古代的、近现代中国的理解，要看一个现代国家如何应运而生，就必须了解参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人们从何而来，要看“新”的思想与行动产生的土壤在何处培育，则要看到这群人接触到外来世界的契机在何处种下，其生长的水土、其祖辈与海洋打交道的世代经验之中恐怕早有伏笔。这一时间与空间的联结，交织成了一张不可轻易以常规概念进行切割和分段的历史网络，也迫使我在其中追溯原先所偏好关心的人事的内在渊源。在此之前，我并无意识这一动作对于一个历史专业研习者的重要性。

“联结”的历史感如此强烈地贯穿了整个行程，在读本中阅读到的信息和田野之中的所见所得相互融汇，真正触及了我对于闽粤与海洋文化的认识。我们观看博物馆、走访了城市或乡村之中的庙宇，拜访各类历史人物的故居及相关机构故址，这张面貌复杂、层级错综的历史网络展开之时，我看到的却是我自己的来处：

作为正是在闽地出生，在羊城生活求学刚满十个年头的普通一员，这种历史观带来的冲击尤其巨大。粤语和闽南话作为我相处最久、最为亲近的两种语言，在这熟悉又“陌生”的田野之中交叉遭遇，我得以了解这座生活长久的城市的前世今生；理解自身家族在几个地区人员构成的深层缘由；了解自孩童时期就耳濡目染的各种拜祭仪式的内在理路；同时，我对于在山海之间的故乡于整个海洋史的版图中的位置也才开始有了些许认知，如此种种，成为这一次田野尤为特别又格外撼动内心的特殊体验。因此，我在行走中不仅找到了自己关心的议题在“大历史”背景中的位置，更看到了“我”作为一个个体在此中的位置和关联之处。这也让我更加去思考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要性和不可回避，并以此为出发点，去考量田野之中、乃至以往研究中所遇到的种种。诸如庙宇、坟墓、纪念碑，既是公共表达的空间，同时也是某一类人群远离故乡时安顿灵魂的处所。诸如艺术品、工艺品、图像与文字，由历史中的人创造，从专业的艺术史、建筑史、工艺脉络去看待“物”固然非常必要，但另一方面，如何从更加细致的层面，去关照“物”背后那个更为广大的有“人”的世界，或许也是功课之一。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碑刻馆中，众多泉州的伊斯兰教徒墓碑上都刻着出自《古兰经》的这句话，“死于异乡者，即为壮烈之死。”在整个研习营的最后一站看到它，让我非常感动，这或许可以概括我对于这一次研习营最重要的感受：在海洋人群的聚散与各种重要的历史节点中，“故乡”与“异乡”恐怕是更为重要的议题，因为它们涉及一个人最为迫切的需求。当一个人前往一段旅途，不论是出海捕鱼、经商还是传教、朝贡，他面临的挑战和未知都难以想象，于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生死须有安顿、技艺须被打磨、知识需有记录、娱乐和信仰须有处所，由此，理想和志业才有机遇，人群的联结、聚合才成为可能。不忽略个体的壮烈，壮烈的历史画面才成为可能。但事实上，作为历史学的研习者，恰恰更容易在自身的训练路径及思维惯性中疏忽了这一点。

一千多公里路途的辗转，建立起了关于“闽粤海洋”的历史想象，而一处处具体的田野点及探访，则给如我这样身处现场而不自知的学习者以切实的现场感和体验，尽管时间依旧仓促，关于这段浩大而庞杂的历史在这一程中远远不能窥其几分之一，但这次的收获，相信会一路伴随今后的学习及人生旅途，时时警醒。最后，感谢辛劳的老师们和一路全心投入、并肩学习的同伴们。